

宋以丰  
惠州学院/  
湖南师范大学

## 翻译“介入性”研究:学理与释例\*

**【提要】**文章借用萨特存在主义思想中的“介入”概念,将其引入翻译研究,提出了翻译的“介入性”主张。文章认为,翻译的“介入性”是生成性与历史性的概念,是从发生机制、存在状态和作用效果等角度,对翻译本质的另一种界定,它和翻译的“忠实”概念既没有必然的统一性,也没有必然的对抗性。“介入性”主要涉及翻译的人本性、情境性以及翻译在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中的“参与性”,它要求翻译关注当下,反思现实,关涉人伦道德,履行社会责任,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乌托邦文学翻译的现实批判与社会想定之中,而且更体现在严复、鲁迅和瞿秋白的爱国主义、革命主义与人文主义翻译之中。

**【关键词】**介入,历史性,入世性,乌托邦,寓言式书写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648(2018)03-0001-08

DOI:10.19502/j.cnki.2095-9648.2018.03.001

“介入”研究既是翻译功能研究,又是翻译本质研究,涉及翻译的根本属性。1988年,吴泽林发表“试谈文学翻译的文化交融本质”,首次探讨了翻译本质问题(吴泽林 1988:22-25)。次年,冯任远发表“试论翻译本质与其他”,再次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与阐述(冯任远 1989:77-83)。吴、冯二文之后,关于翻译本质的研究逐渐增加,相关成果达二百余篇(种),主要观点如下:1. 翻译是认识活动;2. 翻译是再现活动(袁志广 2000:32);3. 翻译是补偿行为;4. 翻译是再叙事;5. 翻译是转换行为。以上观点视角和着力点不同,各有其理,也各有不足。事实上,翻译本质的生成是历史性的概念,它与翻译环境有关,具有多样性和动态性(刘云虹、许钧 2016:97)。翻译与环境之间的血亲关系主要表现为翻译的“介入性”,即翻译的文化心理动机和改造社会的“入世性”。

### 1. “介入”说:内涵与翻译

伊格尔顿(1999:25)曾经批判文学本质,认为文学经典或民族文学的“伟大传统”与特定时代、特定缘故和特定人群有关。卡勒(1998:23)也说,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只与特定社会的认知有关。可见,文学的裁决取决于文化与历史环境。翻译也是如此,其行动、责任与担当既源自环境,最终又复

归环境,此所谓翻译的“介入”本质之所依。

#### 1.1 “介入”概念的内涵

“介入”概念源自哲学,但术语的发起者却是萨特。1960年,萨特为阐述文学本质首次提出“介入”概念,并为此新造“*littérature engagée*”一词。萨特(1998:170-171)认为,文学不可沦为纯粹的形式或颂歌,而“应该要求一切”。对于一个时代而言,其文学必须而且只能体现该时代,应该表明立场,否则便会毫无意义。同理,作家所写的句子和作品也必须在“人”或社会产生反响,否则也会失去其意义。所谓文学即是说话,而说话即是行动,即是揭露,应该“澄清争论,采取立场”,带来改变(萨特 2000:106)。之所以如此,是由文学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同时也和它与哲学之间的差异有关。文学艺术不同于哲学,应该直接介入生活,所谓“存在先于本质”,就是要让文学艺术脱离理性主义决定论,鼓励文学或文学家“自为”而非“自在”的存在,使他们参与社会,干预政治,肩负起历史使命(萨特 1989:118)。比如福楼拜和马拉美等“解脱型”作家,其作品便是“深层的介入”,是“圣经意义上的真正激情”,这样的介入不仅“承担全世界”,而且“承担整体”(萨特 1998:338-339)。所谓“介入”就是让文学关注当下,反思现实,关涉人伦与道德,惩恶扬善。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晚清翻译政策研究(1840-1911)”(项目编号:17YJA740043)、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学科共建项目“晚清西学翻译中的政府因素研究”(项目编号:GD16XW17)及惠州学院重点重大研究培育项目“晚清翻译政策研究(1840-1911)”(项目编号:hzzs1201614)的部分成果。

### 1.2 “介入”的内涵式翻译

“介入”概念是萨特存在主义文学观中的核心概念。关于此概念,《法汉词典》中的解释是作家的“态度”和“行动”。而在《牛津英汉双解词典》中,“engagée”被解释为“负有道德义务”。可见,与《法汉词典》相比,《牛津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显然降低了“engagée”的政治对抗意义。关于“engagée”该如何翻译,看法并不一致。如《存在与虚无》的英译者认为,法语中的“engagée”极为复杂,其语义之广超过了英语“commitment”、“involvement”、“immersion”、“entering”和“engagement”中的任何一个,因而用后者翻译“engagée”均属不妥(郑海婷 2016:8)。当然,也有持相反看法的。如 Adorno(1991:40)认为,在将某一概念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文字时,如果没有万全的解决之道,翻译时便只能陷入目标语的“顺应机制”。由于英语中缺乏与“engagée”直接对应的表达方式,于是只能选择“engage”、“commit”和“intervene”等进行释义,这么做不会造成语义上的明显损失。例如,在特里·伊格尔顿、弗·詹姆逊和爱德华·萨义德等人的作品中,“engage”、“commit”和“intervene”常被混用,便是例证。斯蒂文·恩伽尔(Steven Ungar)在翻译《什么是文学?》时,便将“littérature engagée”译作“committed literature”,认为这样的翻译能够表达“自觉的价值主张”(Ungar 1988:4)。同理,法语学界在翻译“le bouddhisme engagé”时,也选用了“Committed Buddhism”的译名,理由是“commit”比“engage”更具行动性,更强调担当与责任,这样的用法与“engagée”的原初意义无本质不同。又比如,将“Engaged Buddhism”译为“入世佛教”或“左翼佛教”,虽然没有照顾到“engagée”的特殊内涵,尤其是法语社会关于该词的集体记忆,但透过译文仍然可以看出“engagée”的政治性和抗争性,基本保留了后者的核心内涵。

### 2. 翻译“介入”研究:现状与不足

国内的翻译“介入”研究始于1991年。同年7月,董朝斌以“两种介入方式:创作与翻译”为题,阐述朱雯翻译和创作的主要特点,开启了翻译“介入”研究之先河。董朝斌(1991:41)认为,朱雯的翻译和创作有明显的价值取向,它们“干预现实和时代,忠实于民族和人民的需要”。可惜,董文发表之时,国内对于西方翻译理论尤其是“文化转向”后

的各个学派介绍与研究较少,加之董文自身并没有将焦点放在“介入”的讨论上,因而该文的发表并没有在学界产生实质影响。直到多年之后,王福祥(2006)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出发,阐述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意义生成的历史性,以及价值观念作用于翻译过程的具体情况,并特别提及严复的“意见领袖”式翻译,即通过翻译“攻击封建专制制度”(王福祥 2006:34),重新点燃了翻译的“介入”研究。

除董文与王文之外,以“介入”为题的翻译研究还有不少。CNKI的统计表明,1991年至今的研究数量多达80余种,依其视角与重心的不同,上述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1. 文化因素介入研究,如王东风(1998)、文军和邓萍(2005)及许钧(2016)等;2. 译者主体性介入研究,如蓝红军(2004)和刘娜(2013)等;3. 读者因素介入研究,如吴莹(2007)和张继文(2009)等。上述研究中,以第一类研究数量最多,这些研究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或学理框架,并运用不同的分析工具或研究方法,对翻译中与生俱来的“介入”现象进行分析和探讨,为理解翻译行为的复杂性以及翻译“介入”的多样化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由于多方原因所致,上述研究有关“介入”的理解和阐述不仅与董朝斌(1991)和王福祥(2006)不同,而且与本文也存在明显差异,其差异主要在于:本文中,所谓“介入”一词是行动哲学意义上的概念,是存在主义哲学观和文学观在翻译中的辐射和挪用,强调的是翻译对于社会制度或社会秩序的揭露和干预,而王东风(1998)等所说的“介入”概念是翻译的影响研究,即广义上的文化因素(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以及译者与读者因素对于翻译的影响。如王东风(1998:6-9)的《论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介入》,实际论述的也是“审美”、“政治”和“伦理”三种文化类型对于翻译过程的具体影响。文军和邓萍(2005:81-86)通过分析 Nida、Lorscher 和 Bell 的三种翻译过程模式,并借助 Katan 对于文化的逻辑分层,阐述了介入翻译过程的文化因素类型,以及文化因素介入翻译过程的具体方式。许钧(2016:433)的情况有所不同,它阐述的是翻译批评的“介入”性,认为翻译批评应该“介入性”翻译实践,包括翻译实践的动机、方法和质量。不过,三者论及的“介入”显然不是萨特的“介入”概念,也不同于本文,因为它们都不涉及翻译的行动性和“入世性”。

### 3. “介入”式翻译经典案例

翻译是社会现象,这一点毋庸置疑。古安尼克认为,翻译应该重视文化产品的社会功能(Hermans 2004:132-133)。皮亚杰(2002:1)也说,社会现象研究应该重视人的一切特征。正如翻译的生产、传播与接受离不开译者对于现实的把握一样,翻译研究也必须从社会情景出发,对翻译的处境动机加以认识和描述。翻译产生于社会,又服务于社会,必然涉及社会宏观结构中的诸多因素。在阶级社会中,翻译从来都是文化政治立场或倾向的表现形式,这一点自汉唐佛经翻译以来即是如此,而在清末民初之际则更为显著。无论是李提摩太等的“乌托邦”文学翻译,还是严复、鲁迅和瞿秋白等的其它西学文本的翻译,所反映的皆非“屈从行为的内化”,而是译者在规范面前的自主选择。这些选择不仅考虑读者需求和母语文化的威望,而且考虑译者自身的主观信仰、价值追求以及社会的制度建设。为确保论证的充分性,下文将对上述四种翻译行为逐一阐述,目的不是为了揭示翻译在“场域性”面前的“随附性”,而是其积极的“介入性”。

#### 3.1 “乌托邦”小说翻译中的入世性

长期以来,乌托邦文学被界定为“非文学”,认为它具有“非现实性”。L·蒂默尔·杜坎普和劳拉·奎尔特等甚至将乌托邦文学当作科幻小说。而事实上,乌托邦文学本质上仍是“社会梦想”,体现文学和社会的血亲关系,它既批判现实,又设定理想社会,体现文学对于社会现实与秩序的强大“介入”。近代中国的乌托邦文学兴于清末,有着强烈的文化心理动机,面向未来的前瞻性以及积极“介入”现实和改造社会的“入世性”。郑孝胥指出:“读尽旧史不如意,意有新世容我侪”(见耿传明 2008:176)。康有为说:“教之不善,经之无用”(见耿传明 2008:190)。这些都是国人在旧秩序、旧文化的裹挟下希望颠覆传统,翻转价值,实现政治启蒙的入世理想。乌托邦文学的兴起吻合了这样的民族心理,如梁启超的“政治小说”、革命派的乌托邦小说等,其核心思想是以“乌托邦”寓言未来的方式表达改造社会的理想。

乌托邦小说与中国的结缘得益于李提摩太,它是时代的产物。1891年12月至1892年4月,李提摩太将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改译为《回头看

纪略》,发表在《万国公报》上。没过多久,该书又以《百年一觉》为名由上海广学会再版。据熊月之考证,李提摩太于1893—1894年间将此书改译为《百年一觉》之后,出版销售的单行本多达两千余册。这些书籍一方面在书市销售,一方面大量赠送给官吏和士绅,其在读者中得以迅速产生影响并引发讨论。比如,1898年,光绪皇帝为求变法,曾广泛订购西书,其中便有《百年一觉》。李提摩太翻译此书,为便于宣讲和传播基督教思想,翻译策略上有意靠拢中国固有文化,利用传统思想文化资源对译本进行改编,如将“大同”概念注入“乌托邦”理想等,并在译本中增加原著中所没有的基督教内容,这么做的好处在于:一来可以照顾读者的阅读和接受,二来又可以借此扩大基督教的传播影响中国社会。李提摩太(1891:15)指出:“西国诸儒因其书多叙养民新法,一如传体,故均喜阅而读之,……今译是书,不能全叙,聊译大略于左”。可见,李提摩太译书是讲策略的,对于什么该全译,什么可省略,有他自己的理解和把握。当译本遇到不能全译的情况时,那些能体现小说艺术功力,但与思想主旨无关的内容则被删略。这种译法客观上为晚清文人志士希望通过小说启迪民智的理想信念提供了支持。

陈大康(2002:71)认为,晚清的小说创作与翻译“数量出现惊人的加速递增趋势,明显地始于甲午中日战争”,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乌托邦小说的翻译。乌托邦小说的发展并非纯粹的文学事件,而是与国家危机的深重有着直接联系,这一点符合晚清士绅和文人以小说为政治工具的时代诉求。乌托邦思想家大多持有“全社会”的观点,能从整体的角度看待人类的发展,这样一种处理个体和群体的态度也吻合了晚清知识界的“群”话语和“国民”观念。比如《黄绣球》中就有明显的群体性和整体性观念,这种观念是晚清新小说的整体特点,对于乌托邦作家塑造理想“国民”极具意义。与此同时,乌托邦文学的翻译家们也希望通过翻译,将自己的理想信念落实到改造社会的行动中,以翻译谋求社会变革。诚如曼海姆(2001:302-303)所说,社会要发展,必不可离开乌托邦。一个社会一旦摒弃乌托邦,必将失去塑造历史的意志,以及理解历史的能力。

#### 3.2 严译社科名著中的爱国主义

严复的翻译向来以标准清楚、目的明确、策略

适宜、社会关怀强烈而出名。他翻译西方著述能紧贴形势,并参之己见,希望能藉由译书引起社会效应。在这一点上,严译《国富论》更是如此。

众所周知,“按语”是严译名著的一大特色。《国富论》的翻译中,严复同样增加了不少按语。这些按语提到了李嘉图、穆勒和罗杰斯等对于斯密学说的修改和补充,但没有影响严复对于斯密学说的笃信。西方经济学传统中,斯密并非重商主义的代表。所谓“重商主义”就是指“经济活动从属于国家政权的利益”(史华慈 1995:108),而斯密的许多观点乃是纯经济学的。既然斯密不是重商主义者,那么又怎能服务于严复的政治目的?对此,严复的解释是:虽然斯密反对重商主义,但他反对的只是重商主义的措施,而不是重商主义的目的。斯密(2010)不同于马克思·施蒂纳,他不认为个体与社会之间势不两立,相反个体与团体利益相互关联。在《国富论》中,斯密常使用“普通利益”与“公众幸福”等表达方式,甚至用“社会”表示经济活动的最终受益人,认为“社会”虽然由个体构成,它与“民族”、“国家”等却可以互换。因此,说经济活动的最终受益人是“社会”和说最终受益人是“个人”本质上是相通的。正是在此意义上,斯密学说和严复的“国家富强”得以粘合。

严复从《国富论》的翻译中,不仅看到了自由经济主义体系,而且看到了爱国主义。如在《国富论》的“论公债”一章中,斯密批评了英国的公债政策,认为它是“毁灭性的权宜之计”(斯密 2010:737)。严复指出,正是由于斯密对英国政府的警告和规劝,英国才逐步建立起完善的自由经济主义体系。他说:“……英国自斯密所处之世以来,其所以富强之政策众矣。格致之学明于理,汽电之机达于用,君相明智,而所行日新,然自其最有关系者言之,则采是书之言”(严复 1986:920)。严复还认为,“公债”政策之所以没有让英国万劫不复,是因为政府鼓励自由经济,补偿了“公债”的不利影响,而在中国,民众的经济活动长期受到压制,因而国债的增加只能是抽取整个社会的财富(同上:920)。严复在《国富论》的翻译中,虽然对于书中某些思想的评价有别于斯密,但通过此书的翻译,在爱国主义的问题上找到了与斯密的情感契合。

### 3.3 鲁迅翻译中的寓言式书写

研究鲁迅的创作与翻译,无法绕开“五四”的话题。梁实秋(1998:27)认为,“五四”以来的中国

新文学属浪漫主义文学,而“五四”所推崇的正是新浪漫主义。新浪漫主义以非理性主义为价值立场与审美形态,以生命哲学与诗学为创作话语的意义本体内涵,带有明显的存在主义和“介入”特征。在翻译上,“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与文学创作有着惊人的同一性,所谓文学翻译也是要“借他人酒杯浇个人块垒”,希望翻译与创作一道,有助于社会进行思想与政治改革,共同满足新的时代要求。如周作人翻译契可夫的《可爱的人》时,认为女主角试图“以爱慰藉甚至是平庸的男人”,是缺乏独立人格的表现;在翻译《改革》时,又对作品中的男性意识提出质疑,认为自己并非简单地附和原著,而是因为后者背离了“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观念,因而“狠可研究”(陈改玲 1996:77,80)。

鲁迅的翻译成就主要体现在“为人生”文学上。自《小说月报》首辟“俄国文学研究”专栏后,苏俄文学的译介规模日益放大。在众多译家中,鲁迅作为“为人生”文学的旗帜,翻译上尤其积极,他不仅积极译介俄国与东、北欧“为人生”文学,而且将自己对于文学的思考写进译本序跋中。在其思想发展的前期,鲁迅立足人道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致力于揭露国民劣根性,这一点是他译介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着眼点。比如,他盛赞托尔斯泰是“偶像破坏的大人物”,又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敢于“将灵魂显示于人”(王德禄 1985:41)。而鲁迅自己的翻译文学,也有着明显的民族寓言书写和民族想象构建的特色。

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适逢现代转型,此时西方文学作品被译介进来,成为知识分子书写民族寓言,开展民族想象的有效手段。Jameson曾对鲁迅作品进行系统的寓言式阅读,对其表现手法的素材与用词进行认真考查,认为鲁迅乃是“政治知识分子”的代表,并认为其可贵之处在于揭示了塑造现代民族的政治责任(Jameson 1986:74)。Jameson(1986:86)认为,第三世界的文本都是寓言式的,即所谓“民族的寓言”,这一点在鲁迅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1903年,鲁迅翻译《月界旅行》,希望通过此书“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并在译本中加入大量本土元素:将英法比作“倏倏国”,将美国比作“龙伯”,同时援引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以及陶渊明的“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等,目的是为了给民族寓言的书写提供便利。韦努蒂(2004:482)认为,翻译时在外域文本中

铭写本土观照会降低传递外语文化的功能,鲁迅的翻译即属此种。然而,鲁迅式的铭写有着强烈的翻译目的与选择性,对于构建新国民的身份特征起到了重要作用(李建梅 2014:73-75)。

同样的情况也见于鲁迅翻译的其它作品,如《芳梯的来历》和《斯巴达之魂》。两部作品的故事结构都很简单:前者说的是纨绔子弟在大街上欺凌妓女的事,女子因为抵抗殴打反被警察逮捕;后者说的是斯巴达战士反抗波斯人入侵的事。两篇译作都发表在《浙江潮》上,主题上看似各不相干,对于鲁迅而言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芳梯的来历》译本中,鲁迅将掷雪球者取名为维纳亚克,目的是要表达他对于弱肉强食的愤慨,因为维纳亚克在佛教中即“好色的魔鬼”之意。而鲁迅在翻译《斯巴达之魂》时,适逢沙俄入侵满洲,此书的翻译是要借“斯巴达的故事,来鼓励我们民族的尚武精神”,敦促清廷抵抗外国侵略(许寿裳 2010:14)。对鲁迅来说,翻译与创作一样,动机性都是很强的。鲁迅本人向来重视小说与翻译的教化作用。如《月界旅行》的“辩言”中所说:

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故撮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则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鲁迅 1973:9-11)

以翻译作为破除迷信,改良思想和补助文明的重要途径,是鲁迅对于翻译的精心设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鲁迅先后翻译了安德烈耶夫的《默》和《漫》,契里珂夫的《外省人》以及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后来又翻译了迦尔洵(Garshin)和果戈理等人的作品,究其原因是一些作品中有一种“被颠倒的现实主义”,既有隐晦的象征,又有引人注目的现代性和创新性,这与他的文学和政治目标相适应。鲁迅一生矢志于批判传统文化体系的消极功能,以及这种消极功能造成的道德伪善,其作品通过提出一系列思想革命问题,如对于国民性的探讨,对于旧中国社会悲剧的根源的挖掘,对于遁世无为和尚柔贵雌观念的鞭辟等,揭示了一个是非颠倒,锈蚀灵魂的“惨世界”,不仅动人以哀,而且予人以力。鲁迅的翻译整体上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它们不仅配合了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需要,甚至成为鲁迅自身革命实践的重要部分,其社会参与性之强,在同时期翻译家中

实属难得。

### 3.4 瞿秋白翻译中的革命情怀

相比于鲁迅,瞿秋白的革命意识更为强烈,这是由双方的不同身份所决定的。鲁迅是文学家,旁涉政治,而瞿秋白是政治家,兼顾文学。瞿秋白(1985)曾说,文艺就是要在情绪上统一并团结阶级斗争的队伍,在思想和意识上武装群众。瞿秋白把这种极其明确的政治取向用到了翻译上,认为翻译必须为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做出贡献。1931年12月5日,瞿秋白致信鲁迅,一方面是因为鲁迅当时领导着左翼文学运动,另一方面则是鲁迅翻译的文学理论和作品跟自己的翻译目标相配合。尽管二人因为身份的不同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着分歧,在翻译的大方向和出发点上却是相近的。瞿秋白(1985)认同鲁迅的语言观,认为中国的语言和文字都很贫乏,翻译有助于语文改革的责任不可推脱。然而对于鲁迅的“需要读者忍受不顺”的观点,他却持保留意见,认为这一说法战术上偏于“防御”,而他要求译者“反守为攻”,即译本不仅要“信”而且要“顺”。固然,瞿秋白并非出色的翻译理论家,实践经验也不算丰富,但鉴于政治家的身份,对于翻译的革命性质有着异于常人的要求和认识。在他看来,一部翻译作品能否成功,在于它能否对当前的政治运动做出贡献,“顺”的翻译有助于普罗大众的阅读与理解,以及发挥译文的政治作用,当然是好的翻译。因此,“顺”与否的问题不是翻译的本体论问题,而是关系到政治革命的问题。瞿秋白从自己的政治立场出发,提出他关于翻译实践和理论的想法,明显受到其历史与政治哲学理论的影响(Florent 2008:58)。

翻译并非只是两种语言之间的事。Meschonnic(1999:12)指出,语言是一个言语系统,一个错综复杂的“混合体”,它与文化、文学、民族以及个体等都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当翻译把某种语言的信息传递到另一种语言时,“停留在语言上的合适之意会是短促的”。瞿秋白对于中国语言文字的现状与变化,以及翻译的政治使命的分析,正是立足于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方面,瞿秋白认为“五四”的新白话文运动具有欧化的特点,就语言的现代化而言这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如果语言的欧化仅限于知识分子与文化精英,那么文艺与群众之间便会出现裂痕,导致语言和文艺缺乏大众性和民族性,这一点于革命非常不

利。因此,正如勒赛克勒使用“语言学团体”表述“英语”的多元性和混杂性,避免语言含义的同构性与抽象性一样,瞿秋白也试图通过“顺”的翻译构建某种语言类型,扩大革命的群众基础。这种语言既不是“纯粹的古代式的汉文文言”和“用文言适合现代生活的时文文言”,又不是“夹杂着文言的明清时代的旧式白话”和“夹杂着文言的新式白话”(瞿秋白 1985:213)。例如,瞿秋白从自身的意志出发,对严复翻译的《原富》中的一段节选做了评论,解构了翻译中“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最为传统的关系。为了批评严复的翻译,他在文章中列出了斯密文本的三种不同译文,以揭示所谓“中国文”的模糊性与不稳定性。对瞿秋白而言,一个全国的“普通话”的构建既是翻译本身的问题,更是关乎政治实践和政治目的的功能性问题。翻译不但要帮助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而且要面向中国读者输入马、列主义革命思想,因而翻译的任务就是要建立一种可以容纳日常生活的语言,一种活着的、口语的语言,以代替并废除书面的“中国文”(Florent 2008:61)。由此可见,瞿秋白的翻译及其围绕翻译所做的理论诠释,目的主要是为了配合“文化革命”的政治架构。无论是他身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期间,还是他从这一位置上退下来以后,“党性原则”始终贯穿在他对于文化建设的态度之中。例如,在梁实秋与鲁迅的翻译论战之中,仔细对比瞿秋白和梁实秋、鲁迅的发言便会发现,瞿秋白所主张的“口语的白话文”本质上更为接近梁实秋的主张,然而他最终却是选择声援鲁迅,原因就在于鲁迅的“硬译”也是为了译介无产阶级文化思想,而梁实秋的翻译带有明显的自由主义特点。因此,相较于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文艺观,鲁迅的“硬译”反而变得不重要了。

1935年6月,瞿秋白重新撰述《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文艺理论家的普列哈诺夫》和《拉法格和他的文艺批评》等,目的同样是为了借鉴马列主义和苏联思想推进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与此同时,瞿秋白也希望通过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论,指导中国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在《海上译林》上卷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后记”中,瞿秋白明确指出,之所以选择这些文论,是因为它们“包含着很宝贵的指示”,“文艺理论不但要‘解释和估量文艺现象’,而且要指示‘文艺运动和斗争的方

法’”(瞿秋白 1987:225)。他翻译《易卜生的成功》等普列汉诺夫的四篇文章,就是要借翻译反对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这一点和当初反对梁实秋的翻译事出同理。胡秋原认为文艺工作者不要当纯留声机,这是非政治主义的,它脱离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又指出,但凡伟大的文艺工作者,都是有倾向的,比如莎士比亚的作品、海涅的诗歌等。他翻译《列宁全集》第17卷和20卷中的两篇文章,即,《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和《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就是因为这些文章反映了俄国革命的“某些重要方面”,而他翻译高尔基的作品,也是看重了作家和作品的革命意识。高尔基的作品,如《海燕》,在俄国原本就是号召和动员人民起来革命的战斗檄文,而瞿秋白的翻译的也确实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 4. “介入”和“忠实”的辩证关系

伽达默尔曾以语言为突破口,批判传统解释学对于“文本意义”所做的心理学和语法学解释,提出了“语言历史性”的主张,指出任何事物的存在与解释都是历史性的,无法摆脱历史局限性。翻译也是一样,它是效果历史中的事件,是一种在特定语境中进行的筹划活动,具有一以贯之的“介入性”。翻译的“介入性”存在于历史性之中,历史性不是翻译行为完成之后偶尔附加的因素,而是翻译行为的内在构成因素。说翻译是历史性的,并不意味着翻译将其自身置于历史环境,接受环境的监督和制约,而且意味着翻译参与制度建设,完善与强化,或者破坏与消融现有制度和秩序。前者是受动性的,后者是能动性的,而“介入”正是翻译能动性的集中体现。“介入”是从生发机制、存在状态和作用效果等角度对翻译的本质进行的另外一种界定,这一界定和有关翻译本质的其它理解,如翻译的“案本而传”,“依实出华”、“信而不顺”等“忠实”性概念并不冲突。理由在于:“忠实”和“介入”的划分依据不同,“忠实”着眼于译本的物化和形态,“介入”着眼于译本的目的、作用和效果,二者并不存在于同一矛盾体。“忠实”的翻译不见得缺乏“介入性”,“介入”的实施和完成也未必要牺牲“忠实”。“忠实”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介入”则是功能论意义上的概念,二者分属不同的分类标准和范畴,彼此之间既没有必然的统一性,也没有必然的对抗性。

比如严复的翻译,其中固然包含了不少的误读和误译,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则是无意识的。有意识的误读包括原著书名的改写、原著思想内容的改写,以及原著例譬的改写等,这些都是严复的“创造性校正”,体现的是严复个人的公心与时代诉求。然而,严复又是极其重视“忠实”翻译的,所谓“信、达、雅”之说便是他的自律准则。严复的翻译从来都不缺少可圈可点之处。比如严译《法译》之际,因为有较为系统的翻译思想,他对于英文版本的翻译和处理并非完全不及后来的译本。但就是这样“可圈可点”的“忠实”翻译,却并未妨碍严复实现其人文关怀。

又如林纾的翻译,长期以来我们的关注往往集中在其“译述”式翻译策略和文化改写,让人误以为文化政治与社会效应的实现只能依托非正态的翻译,也让人误以为“规范”的作用就是要引导译者在译法上随意发挥,内容上偏离源本。比如,将 *La Dame aux camélias* 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既预示着故事结局的悲剧性,回应了时代背景,又照顾了阅读期待,而将 *Uncle Tom's Cabin* 译为“黑奴吁天录”也让人热血沸腾,唏嘘长叹。这样的译法容易给人假象,似乎林纾式的创译只是“历史性”和“介入”带给翻译的负效应所致。然而时至今日,并没有针对林译作品的完整的量化研究,比如林译中“按本而传”者和“取便发挥”者各占多少比例,林译的整体特点是“正态译”还是“非正态译”,林译之所以广受欢迎和好评,究竟是因为林纾式的创译,还是因为作品自身的体裁、题材和内容等迎合了时代的文化心态和审美理想。事实上,自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中国逐渐由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发展,文化市场出现新的变化,市民的文化消费也出现了新的需求。林译小说的兴起无论是在样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较好地吻合了这种需求,因此才有了林译的成功。由此可见,“忠实”和“介入性”之间并不天然相悖。

## 5. 结语

“介入性”是翻译的根本属性之一,是翻译的本质特征。翻译的“介入”即通过翻译揭露现实,实现社会参与。同其它社会实践形式一样,翻译应该表现人类的普遍处境,以及人在这样的处境中的自由选择,这一点也是翻译之所以能打动人心的关键所在。从成因上看,“介入”既是社会历史发展

的产物,又是译者依据自身心性进行自由选择的结果;从形式上看,“介入”既可以表现为迎合,巩固或强化社会秩序,又可以表现为反叛,弱化或消解社会秩序。从学理上讲,“介入”是文化哲学话语,是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对于翻译史实和现状的诗性把握;所谓“介入”既是翻译进入其存在的肇始,也是翻译终于其归宿的夙愿;既是我们对于翻译的显性存在的本真领悟,也是翻译自身对于社会之沉“思”,是翻译这一“诗”性活动之本质所依。

## 参考文献

- Adorno, T.W. 1991. *Notes to Literature*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ermans, T. 2004. *Translation in System—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Jameson, F. 1986. Third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J]. *Social Text* (15): 65-88.
- Meschonic, H. 1999. *Poétique du Traduire* [M]. Lagrasse: Editions Verdier.
- Ungar, S. 1988. Introduction by Steven Ungar [A]. *Jean-Paul Sartre. "What is Literature?" and Other Essays* [C].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本杰明·史华慈著,叶凤美译,1995,《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 陈大康, 2002, 近代小说及其研究的数理描述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4): 68-73。
- 陈改珍, 1996, “五四”翻译文学与小说创作的“互动”关系 [J], 《中国比较文学》(4): 74-90。
- 董朝斌, 1991, 两种介入方式: 创作与翻译 [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4): 41-45。
- 冯任远, 1989, 试论翻译本质与其他 [J], 《外语教学》(2): 77-83。
- Florent Villard, 2008, 翻译“现代性”: 瞿秋白思想探索 [J], 《江苏大学学报》(1): 58-63。
- 耿传明, 2008, 清末民初“乌托邦”文学综论 [J], 《中国社会科学》(4): 176-190。
- 卡尔·曼海姆著, 艾彦译, 2001,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 蓝红军, 2004, 论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文化背景的介入 [D],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劳伦斯·韦努蒂, 2004, 《译者的隐身: 一部翻译史》[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李建梅, 2014, 翻译·寓言·想象——清末时期鲁迅翻译文学研究 [J], 《外语研究》(5): 73-77。
- 李提摩太, 1891, 《回头看记略》序言 [N], 《万国公报》(12): 15。
- 梁实秋, 1998, 《梁实秋批评文集》[M]. 珠海: 珠海出版社。

刘娜,2013,浅析英译中国古诗翻译主体的审美介入[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4):132-133,137。

刘云虹、许钧,2016,如何把握翻译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创造性? [J],《外语研究》(1):95-100。

鲁迅,1973,《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乔纳森·卡勒著,李平译,1998,《文学理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瞿秋白,1985,《瞿秋白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瞿秋白,1987,《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让·皮亚杰著,郑文彬译,2002,《人文科学认识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萨特著,潘培庆译,1989,《词语》[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萨特,1998,《萨特自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萨特著,施康强译,2000,《什么是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德禄,1985,鲁迅与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J],《山西大学学报》(1):38-49。

王东风,1998,论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介入[J],《中国翻译》(5):6-9。

王福祥,2006,翻译过程研究补遗[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4):32-35。

文军、邓萍,2005,文化介入翻译过程的实验研究[J],《外语学刊》(1):81-86。

吴莹,2007,从关联理论视角审视翻译中的读者介入[J],《山东外语教学》(1):105-108。

吴泽林,1988,试谈文学翻译的文化交融本质[J],《中国翻译》(1):22-25。

许钧,2016,论翻译批评的介入性与导向性[J],《外语教学与研究》(3):432-441。

许寿裳,2010,《亡友鲁迅印象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亚丹·斯密著,孙善春、李春长译,2010,《国富论》[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严复,1986,《严复集》(第4册)[M]。北京:中华书局。

伊格尔顿著,吴新发译,1999,《文学理论导读》[M]。台北: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

袁志广,2000,论翻译过程的本质和翻译过程的“双轨思维制”[J],《语言与翻译》(3):32-35。

张继文,2009,文学翻译中译文读者的介入[J],《电影文学》(14):153-154。

郑海婷,2016,文学介入理论研究——以萨特、阿多诺、朗西埃为样本[D],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宋以丰:惠州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

收稿日期:2018-05-12

通讯地址:410081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

### 首届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翻译与传播研讨会通知

首届对外话语体系建构、翻译与传播研讨会由中国翻译协会对外话语体系研究委员会指导,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主办,同济大学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研究中心、中华思想文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承办。会议将于2018年10月27-28日在同济大学举行。

**会议主题:**新时代中国话语与世界视野

**会议议题:**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与国际话语体系的差异性研究;重要涉华议题的话语创新与翻译研究;智库与话语体系建设研究;中译外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翻译政策与话语传播研究;政治话语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国诗词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国思想文化话语的翻译与传播;中国小说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国戏剧翻译与传播研究;翻译技术和传播理论与实践研究;口译实证研究

**会务费:**800元/人(研究生减半),交通和食宿费自理。

**联系人:**周树霞同学 18721937825